

日本无核政策形成过程的新研究

——《核武装与知识分子： 在内阁调查室诞生的无核政策》介评

董聪利

内容提要：日本的无核政策确立于佐藤荣作时期，佐藤也因此荣获1974年诺贝尔和平奖。《核武装与知识分子：在内阁调查室诞生的无核政策》一书将日本无核政策的形成过程划分为萌芽、构筑、确立三个阶段，对“无核三原则”和“四大核政策”的出台过程、以及围绕《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署问题的国内政治过程等，进行了系统、详细地考察。该书认为，由情报机构内阁调查室发起、由现实主义知识分子完成的核政策研究对佐藤内阁无核政策的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该书不仅是对日本核政策的研究，也兼具日本情报机构研究和知识分子研究的特点。书中征引了大量新近公开或尚未公开的资料，展开了合乎逻辑的论证，对推进日本核政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佐藤荣作 无核政策 内阁调查室 知识分子 现实主义

一、引言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宣布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这令沉浸在东京奥运会欢乐气氛中的日本大为震惊。二十多天后，佐藤荣作（Eisaku Sato）就任日本首相，如何应对中国的核武装成为新内阁面临的重大问题。随后几年，中国继续进行核试验，并于1967年6月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佐藤则在同年12月11日的

董聪利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科 博士研究生。

国会答辩中明确提出“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三项原则，即“无核三原则”。¹ 在佐藤内阁时期（1964年11月9日—1972年7月7日），日本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无核三原则”也被写入国会决议。² 1974年10月，佐藤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主政期间确立无核政策是他获奖的主要原因。日本的无核政策是如何确立起来的？《核武装与知识分子：在内阁调查室诞生的无核政策》一书对该问题进行了回答。³ 该书聚焦于日本内阁直属的情报机构内阁调查室（以下简称“内调”），认为内调委托知识分子进行的核政策研究对无核政策的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该书作者岸俊光（Toshimitsu Kishi）是日本每日新闻社的记者、评论员，先前主要关注慰安妇等历史问题，2009年至2010年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期间，开始调查日美“密约”问题。⁴ 2012年，岸俊光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专门研究内调和日本的核政策，该书的原型就是他的博士论文。⁵ 内调作为一个情报机构，一直以来因为资料难以获取而未被学界充分研究。岸俊光则发掘了大量尚未公开、由个人私藏的资料，以丰富的一手资料为支撑写成该书，这对我们把握佐藤政府无核政策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首先总结该书的主要内容，然后就其贡献、特点和不足之处作出评价。

二、主要内容

该书第一部分围绕“内阁调查室是什么”这一问题展开，分三章考察了设立内调的来龙去脉，创立初期实施的中国调查，以及知识分子人脉构建活动；第二部分聚焦于内调的核问题研究报告书，并对佐藤时期无核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考察，分析了内调核政策研究与无核政策形成的相关性。终章探讨了日本无核政策的遗留课题。

（一）“内阁直属的情报机构构想”

《旧金山和约》即将生效前夕，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Shigeru Yoshida）认为，独立后的日本应有自己的情报机构。由此，内调于1952年4月9日设立。1952年

1 “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这三项内容早在岸信介（Nobusuke Kishi）担任日本首相期间就已被分别提出，佐藤的贡献在于首次将三者合并，指出它们是日本关于核武器的三项原则。

2 1971年11月24日，日本众议院通过《关于无核及缩小冲绳美军基地的决议》（「非核兵器ならびに沖縄米軍基地縮小に関する決議」），其中规定“政府遵守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

3 岸俊光『核武装と知識人：内閣調査室でつくられた非核政策』勁草書房、2019年。

4 即搭载核武器的美国军舰停靠日本港口时，日美两国是否需要事前协商的问题。

5 岸俊光「日本の非核政策形成と『現実主義者』の役割（1952—1974）——佐藤栄作政権期の内閣調査室『核保有研究』を中心に——」早稲田大学博士論文、2018年。

10月末,绪方竹虎(Taketora Ogata)就任国务大臣兼内阁官房长官,他希望将内调发展成具有卓越的调查分析能力、可协调各省厅情报信息、直通首相及官房长官的情报机构。绪方的构想得到了内调首任室长村井顺(Jun Murai)的认同。同年1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副局长杜勒斯(Allen Welsh Dulles)也建议日本推进中央情报机构的组织化。然而,绪方曾担任情报局总裁的经历引起日本媒体对言论统制再度复活的高度警惕。¹在吉田茂亲信的排挤下,绪方于1953年3月卸任官房长官,村井也在同年底被调离。绪方的构想只实现了一部分,内调最终仅维持在以调查分析为主要业务的小部门规模。需要说明的是,内调并非日版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但它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密切。每年有部分内调职员应美国中央情报局邀请赴美考察,并接受相应的情报技能培训;内调还与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日职员举行联合会议,接触频繁时期双方会晤高达每月六次。

(二)“内阁调查室的中国调查”

防止日本“共产化”是内调成立时的重要任务,中国也因此被列为首要调查对象。询问战后从中国大陆遣返回国的日本人是内调调查中国的重要渠道。从1953年至1955年的内调资料来看,中国的农业、地下资源开发、铁路网等信息受到内调的关注。此外,访华的日本代表也是内调的问询对象,比如1957年访华的日本物理学代表团。问询内容不仅包括中国物理研究所的规模、主要成员、设备情况、研究课题等,还有中国的飞机场设施、航班安排等一般性信息。除了调查,内调还为批判中国的书籍提供出版支持,试图修正当时日本国内同情共产主义、同情中国的舆论氛围。内调在创立之初就高度关注中国的这一倾向,为其后在中国核试验后立即着手开展核政策研究埋下了伏笔。

(三)“内阁调查室的知识分子人脉”

内调职员志垣民郎(Minro Shigaki)从1953年起即在杂志上发文批判清水几多郎(Ikutaro Kiyomizu)等进步派知识分子,同时他也积极接近体制派知识分子。东京大学的学生团体“土曜会”是志垣的重点接触对象。该团体反对共产主义革命,主张通过体制内改革建立真正独立的日本。内调为“土曜会”的刊物《时代》提供文章素材、内容指导和出版资助。该团体的很多成员后来活跃于媒体、政府、学界,其中的若泉敬(Kei Wakaizumi)、粕谷一希(Kazuki Kasuya)等人为20世纪60年代内调的核问题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持。作为国际问题专家的若泉不仅参与了内调的核政策研究,还以个人身份在核政策和冲绳“归还”问题

1 日本情报局成立于1940年12月,任务是强化政治宣传、思想统制,促进形成支持战争的舆论,系内阁直属的情报机构,1945年12月被撤销。绪方竹虎原是朝日新闻社的主笔、副社长,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担任日本情报局总裁,日本战败投降后也短暂兼任情报局总裁。

上为佐藤荣作出谋划策；担任综合杂志《中央公论》编辑的粕谷则向志垣推荐了一些现实主义知识分子。¹

（四）“无核政策的萌芽与若泉论文”

内调对核问题的关注并非始于20世纪60年代，其机关刊物《调查月报》自1956年1月创刊起就关注了核武器、核能及禁止核试验运动等议题。不过，在中国首次进行核试验之前，内调仅在1960年5月的《调查月报》上简短介绍过中国核研究的情况。并且，池田勇人（Hayato Ikeda）内阁并不看好中国独自开发核武器的能力。

中国进行核试验后，内调立即委托若泉敬开展核政策研究。1964年12月2日，若泉完成《中国核试验与日本的安全保障——关于我国应采取的基本政策的方向》一文。该报告批评了当时盛行的两种对立观点：非武装中立论和日本独立核武装论，认为单独防卫在核时代不可行，日本应坚持日美安保体制，向美国寻求核保护，不应进行独立核武装。但是，日本要拥有高于中国的核开发潜力，可优先发展和平利用核能、使用国产火箭发射人造卫星等项目，向世界展示日本的核潜力。该报告后来被分发至首相官邸等部门。1965年1月，佐藤荣作在日美首脑会谈中提出日本不发展核武器、希望美国利用核武器保护日本。岸俊光认为，佐藤的这一表态与若泉的报告有关。

（五）“无核政策的构筑与首相献策”

1967年3月8日，参与内调核政策研究的矢部贞治（Teiji Yabe）和佐伯喜一（Kiichi Saeki）向佐藤汇报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我国核政策的问题点》。该报告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核武器开发对远东战略体制的影响不大，但会在核安全和核扩散问题上对世界造成冲击。在此背景下，报告建议：（1）日本应支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推动实现全面禁止核试验。（2）日本应采取以下安保措施：第一，坚持日美安保体制，最大限度地利用美国的核威慑力；第二，改善日本国民的“核过敏体质”；第三，不进行独立核武装。岸俊光认为，该报告促进了佐藤内阁无核政策的构筑。

1 在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围绕安全、外交问题涌现出一股现实主义思潮，代表人物有高坂正尧（Masataka Kosaka）、永井阳之助（Yonosuke Nagai）、若泉敬、卫藤沈吉（Shinkichi Eto）等。在理论上，他们主张核时代的国际政治依然是权力政治，国际和平、国家安全的实现依赖于势力均衡；强调权力来源的多样性，除了军事力量之外，经济力量、科技水平、国民共识、道义等因素也是权力的来源。在政策上，他们反对非武装中立论，主张日本应维持日美安保体制（也可采取其他替代性措施）；反对日本独立核武装，主张依靠美国的核保护；认为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符合日本的安全利益，日本政府应积极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央公论》是现实主义者发表言论的重要阵地，粕谷一希对此发挥了重要作用。参见：根津朝彦「編集者粕谷一希と『中央公論』——『現実主義』論調の潮流をめぐって——」、「『総研大文化科学研究』第4号、2008年、57—81頁。

同年12月11日,佐藤在国会提出“无核三原则”。在随后的第58届国会期间(1967年12月27日—1968年6月3日),佐藤内阁的核政策被逐渐构筑起来。1968年1月30日,佐藤进一步提出“四大核政策”——遵守“无核三原则”,促进国际核军控,依赖美国的核威慑力,全力推进核能的和平利用。“四大核政策”由若泉敬起草而成,他认为仅提出“无核三原则”是不充分的,“无核三原则”的维持依赖于其他三项政策的实施。在国会答辩中,“无核三原则”与法律、宪法的关系逐渐被确定下来,具体内容是:自卫限度内的拥核、他国核武器的运进并不违宪;“不拥有”“不制造”与1955年《原子能基本法》中对核能的开发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的规定有关;“不运进”则与法律、宪法无关。

(六)“无核政策的确立与核武装研究”

从1963年至1970年内调共委托知识分子撰写了17份核问题研究报告书,¹并形成了志垣民郎—楠田实—木村俊夫—佐藤荣作的汇报通道。²其中,1968年9月和1970年1月分两部完成的《关于日本核政策的基础性研究》是内调核政策研究的集大成者。该报告由永井阳之助、蜡山道雄(Michio Royama)等人主持撰写,来自火箭工程、核能技术、军控、国际政治等多领域的专家参与其中。报告从技术、组织、财政、战略、外交、政治六个角度评估日本核武装的可能性,结论认为日本发展核武器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般容易,而是困难重重,并且独立核武装并不会让日本更安全,反而会导致国内分裂、外交孤立。简言之,这份诞生于日本决定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前夕的报告全面否定了日本独立核武装这一选项。

围绕《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问题,无论是在负责交涉的外务省内部,还是执政党自民党内部,最初均存在同意签署和反对签署的不同意见,自民党更是在佐藤内阁宣布签署的一周前才就同意签署达成一致。内调也在1969年11月

1 包括:「原子力潜水艦寄港反対運動の背景——とくに科学者の反対運動について」(1963年5月)、「原子力潜水艦寄港反対運動における学者・文化人の実態」(1963年7月)、「戦後の科学運動と“進歩的”科学者」(1963年12月)、「中共の核実験と日本の安全保障——わが国のとるべき基本政策の方向について」(1964年12月)、「核政策に関する諸問題」(1965年5月)、「わが国の核開発能力について」(1967年2月)、「わが国の核政策をめぐる問題点」(1967年2月)、「日本の核政策と外交——その前提条件」(1967年12月)、「原子力平和利用の現状——放射性同位体および放射線の利用」(1968年2月)、「原子力開発の問題点と体制整備について」(1968年5月)、「日本の核政策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その一)——独立核戦力創設の技術的・組織的・財政的可能性」(1968年9月)、「核戦略の推移と日本の安全保障に関する考察」(1969年1月)、「本邦におけるウラン濃縮」(1969年7月)、「原子力開発における国際的重要問題」(1969年7月)、「『核防条約』の取扱いについての学者の意見」(1969年11月)、「日本の核政策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その二)——独立核戦力創設の戦略的・外交的・政治的諸問題」(1968年9月)、「中国の核開発の推移とその予測」(1970年2月)。

2 楠田实(Minoru Kusuda)和木村俊夫(Toshio Kimura)均是佐藤荣作的亲信。楠田从1964年初开始助力佐藤竞选首相,1967年至1972年担任佐藤的首席秘书官;木村在1966年至1971年担任内阁官房副长官、官房长官,是当时内阁官房的支柱性人物。

初组织14名学者探讨如何应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结果出现了尽早签署论、签署和批准分离论（先签署但尽可能延迟批准）、延迟签署论三种意见，第二种意见的支持者最多。支持签署者肯定条约对核军控的积极意义，认为签署有助于构建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国际形象；主张延迟签署和先签署但要延迟批准的学者则强调，条约对无核国家不平等，而且条约的未来前景并不明朗。最后，日本在1970年2月完成签署，但国会直到1976年6月才正式批准。

（七）“无核政策的本质与未来的课题”

1974年10月，日本共同社报道了美国海军少将洛克（Gene LaRocque）在美国国会的证言，即搭载核武器的美国军舰在日本等国家停靠时，无需卸载核武器。洛克证言暴露出日美两国政府在“不运进”原则上存在认识分歧——日本认为搭载核武器的军舰过境日本属于“运进”核武器的情形，日美应事前协商；美国则认为停靠港口、过境不属于“运进”情形，无需事前协商。这一不同理解意味着“无核三原则”可能实际是“无核2.5原则”。

冷战结束后，美国宣布撤去水面舰艇和攻击性潜水艇上的战术核武器。这意味着以后几乎不存在搭载核武器的美国舰船过境日本的可能性，由此美国如何向日本提供核保护就成为一个问题。在朝鲜多次核试验的情况下，2017年自民党议员石破茂（Shigeru Ishiba）公开指出日本应重新思考“无核三原则”。在安全环境和核武器本身都在变化的背景下，未来日本是否还会继续坚持确立于冷战时期的无核政策令人关注。

在安全环境和核武器本身都在变化的背景下，未来日本是否还会继续坚持确立于冷战时期的无核政策令人关注。

三、特点与贡献

《核武装与知识分子：在内阁调查室诞生的无核政策》一书既是对日本核政策的研究，也兼具日本情报机构研究和知识分子研究的特点。丰赡而稀见的史料、合乎逻辑的严密论证，使得关注以上任一主题的读者皆可从中获致教益。

（一）日本核政策研究

1. 该书将佐藤时期无核政策的形成过程划分为萌芽、构筑、确立三个阶段，从1965年1月佐藤在核问题上的对美表态，到“无核三原则”和“四大核政策”的出台，再到围绕《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署问题的国内政治过程，以及佐藤诺贝尔获奖致辞的构思过程，在该书中都得到了比较详细的考察。这使读者能够从头到尾完整地把握佐藤时期日本无核政策的形成过程，同时可以就每一项具体政策的诞生过程进行研究，并对不同政策进行比较。

比如，读者可以看到“无核三原则”和“四大核政策”的出台过程存在差

异。通过考察佐藤、楠田等人的日记,岸俊光指出没有迹象表明佐藤事先有意要在1967年12月11日提出“无核三原则”。相比之下,“四大核政策”的提出则是佐藤内阁有计划的主动出击。在野党要求把“无核三原则”形成国会决议,而佐藤等则只希望把它作为佐藤内阁或者自民党的政策。而且佐藤认为,立即形成国会决议很可能会束缚日本与美国就冲绳“归还”问题进行的交涉。为此,佐藤提出“四大核政策”,意在进一步确认“无核三原则”是日本核政策的核心,同时强调实施其他三个政策的必要性。可以说,“四大核政策”反映出日本政府既不能无视国民的反核情感,也不愿把它作为制定核政策的唯一考量因素,甚至想要挑战或者改善国民的“核过敏体质”。

2. 该书披露了内调核政策研究报告书的大量内容,认为内调的核政策研究对佐藤内阁无核政策的确立起了重要作用。读者从中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反对日本独立核武装的因素有哪些,这可为评估日本核政策的未来动向提供思考的方向和参照。

在国内层面,知识分子认为国民的反核情感最应受到重视,无视这种情感会拉大政治分歧甚至导致政治不稳定,而且也会使核开发在财政、人员组织等方面遇到障碍。国土狭窄、核裂变材料难以制造等因素也不利于进行核试验。在国际层面,知识分子特意探讨了法国核武装的外部条件,认为无论从历史还是文化上,美法关系和日美关系都存在质的差异。因此,虽然美国允许法国拥核,但却未必允许日本拥核,日本拥核很可能会损害日美间的信任关系。而且,亚洲的政治安全环境不同于欧洲,拥核很可能会限制日本的行动自由,加深中国和苏联对日本的猜疑、敌对。另外,避免核战争有赖于敌对双方的危机管理机制,而当时日本与中国尚未建交、与苏联也有北方领土争端。在这样的外交环境下,日本若拥核,反倒会更不安全。

3. 该书还指出,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影响核政策与佐藤的个性特征有关。佐藤喜欢“耳学问”,即通过听取专家意见来获得知识,其首席秘书官楠田实更是十分看重与知识界的交流,积极向佐藤引荐知识分子。

(二) 情报机构研究

1. 该书所发掘的资料对推进内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该书充分利用了近年公开的《楠田实资料》(又称《佐藤荣作官邸文件》)、《福留民夫氏旧藏若泉敬相关文件》以及已出版的《佐藤荣作日记》《楠田实日记》。同时,还发掘出大量尚未公开、由个人私藏的内调相关资料,主要包括:记者吉原公一郎(Koichiro Yoshihara)收集的内调资料、志垣民郎保管的内调资料及其日记。该书对这些资料的记述与分析使读者能够比较清晰地把握内调的创立过程、业务内容、活动特点等。关于内调的核政策研究,目前只有《朝日新闻》在1994年报道过内调曾撰写《关于日本核政策的基础性研究》。但岸俊光发现,内调在1963年至1970年

共委托知识分子撰写了17份核政策研究报告,而且内调早在1956年就关注了核问题。需要提及的是,岸俊光还协助志垣出版了关于内调的书籍,2020年又组织复制、出版了内调所编写的分析世界政治动向的资料集。¹

2. 该书强调内调的官方智库属性。内调创立时,媒体怀疑它是实施政治宣传、思想统制的情报局的复活。该书认为虽然在内调初创期,与情报局关系密切的绪方竹虎、古野伊之助(Inosuke Furuno)等人确实与内调有关联,但内调和情报局在制度上没有连续性。该书也指出政治宣传是内调的一项业务内容,但从内部文件来看,内调是要按照政府的意向来引导舆论,但并不试图统制思想。有观点认为,内调是像美国中央情报局那样的谍报谋略机关。²该书指出内调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存在合作关系,但认为内调是一个以调查分析为主要业务的机构。该书第二部分对内调的核政策研究与佐藤内阁确立无核政策的关联性考察,更突出了内调作为官方智库的角色特征。

3. 与内调的官方智库属性相关,该书揭示了内调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不仅指出哪些知识分子曾与内调合作、参与内调的核政策研究,而且提出支援东京大学的学生团体“土曜会”是内调构建知识分子人脉的起点。该书还注意到,内调的知识分子人脉与楠田实建立的知识分子人脉有很大的重叠性,若泉敬就是其中的典型。此外,该书大体勾勒出批判左翼进步派、接近体制派知识分子的内调形象,但也指出志垣民郎曾向进步派学者鹤见俊辅(Shunsuke Tsurumi)提供研究资料,鹤见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曾参加内调的审议员会议,协助内调评估国内外形势。这些细节展露出内调的多面性。

(三) 知识分子研究

1. 知识分子研究在日本十分盛行,此类研究或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某一人物或群体的精神世界,或考证知识分子在具体事件或政策中的参与情况。此书属于后者,着力于考察知识分子在无核政策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判断特定人物或群体对某一决策的影响力并非易事。该书主要以志垣民郎、楠田实的证言为立论参照,指出内调通过楠田、木村俊夫向佐藤荣作汇报研究报告,若泉敬为佐藤拟写1968年1月的施政方针演说和“四大核政策”等。但是,该书也不片面夸大、拔高知识分子的作用,注意用其他资料进行证伪。比如,志垣民郎认为1967年矢部贞治、佐伯喜一同佐藤的会谈对佐藤提出“无核三原则”产生了影响,该书则认为矢部等人的报告促进了佐藤内阁无核政策的构筑,但从报告书的具体内容等来看,难以证明它与“无核三原则”的提出有关。

1 志垣民郎(著)岸俊光(编)『内閣調査室秘録:戦後思想を動かした男』文芸春秋、2019年。岸俊光『内閣調査室海外関係資料「焦点」』(全6巻)ゆまに書房、2020年。该资料集预计共36卷,目前已出版6卷。

2 吉原公一郎『小説日本列島』三一書房、1963年。松本清張『深層海流・現代官僚論——松本清張全集31』文芸春秋、1973年。吉原公一郎『謀略列島——内閣調査室の実像』新日本出版社、1978年。

2. 该书大体以“现实主义者”称呼参与内调核政策研究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对现实主义知识分子的研究。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知识分子，学界对日本现实主义者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也相对较少。既往研究多以欧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参照，试图揭示日本型现实主义的特点或比较日本现实主义者在国际政治思想上的异同。¹ 也有研究关注某一特定人物，从思想史路径考察其思想历程或从多个具体议题全面考察其思想内容。² 该书聚焦于现实主义者在日本无核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参与情况，不仅披露了知识分子为内调撰写的报告书，还考察了他们在此之前对核问题的思考。这些工作有利于增进人们对日本现实主义者的认识。

四、不足之处

(一) 从该书内容来看，副标题“在内阁调查室诞生的无核政策”可能夸大了内调在无核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该书的核心论点是，内调委托现实主义知识分子进行的核政策研究对佐藤内阁确立无核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该书的核心论点是，内调委托现实主义知识分子进行的核政策研究对佐藤内阁确立无核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书中也指出，与内调合作的知识分子也会以个人身份而非通过内调为佐藤荣作进言献策。换言之，内调是知识分子与首相联系、进而影响首相决策的渠道之一，但并非唯一渠道。若泉敬为佐藤撰写施政方针演说、“四大核政策”，高坂正尧等人为佐藤撰写诺贝尔奖获奖致辞，这些都是受楠田实所托。

而且，若泉等人的核政策研究成果并非仅提供给了内调，有些也被公开发表。³ 依笔者所见，相较于该书的标题，作者博士论文的题目《无核政策的形成与“现实主义者”的作用（1952—1974）——以佐藤荣作时期内阁调查室的“核保有研究”为中心》更能体现该书的主旨。

(二) 关于内调参与的部分研究说明不够充分

该书终章指出，内调对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的应对十分迟钝。从目前资料来

1 神谷万丈「日本の現実主義者のパワー観」、『国際安全保障』2012年3月号、66—81頁。神谷万丈「日本の現実主義者のナショナリズム観」、『国際政治』2012年10月号、15—29頁。土山實男「国際政治理論から見た日本のリアリスト——永井陽之助、高坂正堯、そして若泉敬」、『国際政治』2013年2月号、114—128頁。张帆：《战后日本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的原点——日本型现实主义析论》，《日本学刊》，2018年第2期，第134—158頁。

2 张帆：《高坂正尧早期国际政治思想述评》，《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第173—184頁。酒井哲哉「永井陽之助と戦後政治学」、『国際政治』2014年3月号、70—83頁。五百旗頭真、中西寛編『高坂正堯と戦後日本』中央公論新社、2016年。服部龍二『高坂正堯：戦後日本と現実主義』中央公論新社、2018年。

3 例如，若泉敬曾发文指出日本应当把不拥核作为一张外交王牌，积极开展核军控和平外交。若泉敬「核軍縮平和外交の提唱」、『中央公論』1967年3月号、68—101頁。

看，直到1971年10月《调查月报》上才出现与中日邦交问题相关的文章；志垣民郎也曾表示，1972年中日邦交的恢复令其感到震惊。然而，与内调合作的现实主义知识分子如蜡山道雄、永井阳之助、高坂正尧等人早就主张应尽早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高坂曾在1964年发文批评日本政府在“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上的不作为”，主张日本必须尽早作出决断，即使可能会因此而损害日美关系；蜡山于1971年初发表的《为什么应该承认中共》一文也广受关注。¹ 与这些知识分子合作密切的内调，尤其志垣作为维系这条人脉的核心人物，对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如此迟钝，不免让人感到有些诧异。

（三）对知识分子的特性考察不足

该书整体将参与内调核政策研究的知识分子称为“现实主义者”，但另一方面也使用了“体制派”“旧自由主义者”等其他词语，并用这些不同的词语描述同一个人物。当具体到个人如若泉敬、矢部贞治时，读者难免会对他们不同身份（如“旧自由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每种身份从哪些地方体现等问题产生疑惑。遗憾的是，作者并未就此作出说明。

（四）部分章节的结构安排略有不妥

比如第二章以“内阁调查室的中国调查”为题，但在五节正文中，只有一节是与中国调查直接相关的。第二部分按照无核政策形成过程的三个阶段分章展开，大体以时间顺序行文。作者在第四章探讨了若泉敬于1964年12月完成的《中国核试验与日本的安全保障》一文后，却在第五章追溯若泉撰写该文之前对日本核政策的思考，这样的结构安排可能不利于读者连贯地把握叙事的进程。

¹ 高坂正尧「中国問題とはなにか」、『自由』1964年4月号、30—45頁。蠟山道雄「なぜ中国を承認すべきか」、『中央公論』1971年2月号、68—83頁。